

第十八章

侵华犯苏的基地

东条兵团和伪军各部进犯华北

历史的发展轨迹清晰地显示：“七七”事变，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接连制造侵华事态的必然结果；而“九一八”事变后出笼的伪满洲国又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广阔的基地。

曾任伪满总务长官的战犯武部六藏曾经供称：“满洲事变成为中国事变的原因，中国事变又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原因，这些事变和战争是日本侵略政策的连锁反应。”^①这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乃是其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必然步骤。当然发动之早晚，不能不受某些临时因素的影响。从日本统治集团的决策来看，1933年6月，即《塘沽协定》签定时，就把军事进攻目标置于中国，“对苏以自卫为主”^②，虽然日本陆军军部在为所谓“应付1935~1936年危机”而讨论国防方针时，也曾叫嚣苏联的“威胁”。此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日本驻国外的最大一支侵略军——关东军，正是沿着扩大

^① 1946年8月30日武部六藏于伯力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8~5页。

^② 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第41页。

侵华的这一“帝国”方针行动的。这一方针的另一体现，是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即盘踞华北的“中国驻屯军”的兵力增加两倍。原来，这支侵华日军主力有两个大队，分驻于天津、北京至山海关沿线。1936年4月18日起，增为两个联队，并成立了隶属于驻屯军的步兵旅团司令部，另外还增设战车、骑兵、炮兵、工兵等部队。《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中央军部命令关东军撤离华北，不能说毫无加强对苏战备的意图；但是，要说增强驻华北日军是因为“担心”“中国军队的轻侮”，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确乎如火如荼，高潮迭起。但是，日本统治集团内心明白，极端软弱、节节退让的中国国民政府，不要说对于日军，就是对于一般日侨都惟恐惹出事来。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狂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与其说是恐惧与反对，莫如说正是利用中国人的反日，制造侵华舆论，和战争借口。这已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事变和一连串的华北事变所证实。上述驻华北日军的增兵，绝对数量是两个大队增为两个联队，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非同寻常的人事安排：步兵旅团长由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重要成员永见德俊少将担任，第一、二联队长牟田国廉和董岛蒿也，也都出身于中国班。不错，1936年夏，日本的国防方针确有调整，苏联和美国都被列为第一目标，同年冬还缔结了“日德意防共协定。”然而，国际法西斯的反苏反共，有其真反的一面，也有其利用反苏反共为烟幕，恣意扩大军事侵略的一面。1937年6月，近卫内阁取代林内阁仅数日，日本激进军阀东条英机就曾进言：从对苏战备的见地着眼，目前必须给中国国民政府以一击。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跑到中国军驻守之卢沟桥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时声称，遭受龙王庙附近阵地中国军队的射

击,且有1名日兵失踪,随即无理要求进占宛平城,并向城内开枪打炮,遂爆发了“七七”事变。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虽曾予以还击,但恐事态扩大,遂接受日军要求,于7月11日与日军签定停战协定。然而,日方是在故伎重演。和制造“九一八”事变时的干法如出一辙:以“不扩大”为烟幕扩大军事侵略。就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当日,日本参谋本部即命令关东军派第一、第十一两个混成旅团火速进关,还从朝鲜抽调了第二十师团。7月13日,日本陆军军部尚在重弹其“不使事态扩大”的陈词滥调,但当19日新增兵团在华北集结完毕之后,7月26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向驻在国内的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以及其他师团下达抽调兵力的动员令,“增派华北”,对中国“行使武力”,并取消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所发的“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的第400号命令。就在此时,日本还在掩耳盗铃,宣称“不扩大方针依然不变”。可是,7月28日晨8时,日军各兵团在华北开始全线进攻。

关东军对于进犯中国内陆迫不及待,7月8日晨即召开会议,叫嚷策划“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同时还向日本参谋本部报告: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和航空兵等部队业已做好出动准备。实际上,未等中央发令,8日当天混成第十一旅团即已开始行动,9日主力在承德、古北口之间完成集结。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正式下达后,立即越长城,集结于高丽营。该旅团原驻锦热一带,拥有步兵两个联队和骑兵、野炮、山炮各1个联队。同时出动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是在公主岭由独立步兵第一联队等部队临时编成的。旅团长酒井镐次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于7月11日编成,当日出发,经承德、古北口,16日到达密云。7月28日晨开始的华北日军全线进攻,投入行动的部队,除关东军第一、十二混成旅团外,还有来自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和原驻华北

的步兵旅团。当时，中国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八师和一三二师驻北平南苑。主攻南苑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和华北步兵旅团，于28日当天下午即占领了南苑，迫使中国军从丰台撤退。混成第十一、第一旅团从北线进攻北平，28日当天，也分别占领了清河镇和沙河镇。驻守天津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的三十八师一部和天津保安队。同进攻北平的兵力相比，天津的日军较少。7月29日，由第二十师团三十九旅团高木义人少将组成的高木支队，被派往天津，主力为3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大队。此外，还把原拟从热河西部向内蒙进攻的堤支队改派天津，同时还由关东军序列的第一师团临时编成的混成第二旅团急派华北侵略战场。堤支队也是从关东军第三独立守备队抽调的兵力，于白城子编成，拥有步、机枪、炮和装甲兵等5个中队。混成第二旅团由步兵第一、第三联队和若干特种兵大队、中队组成。堤支队与高木支队于7月30日和31日先后到达，占领了天津周围；混成第二旅团8月1日侵入天津以南地区。

由此可见，“七七”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在攻占平津方面，是主力之一，出了大力。但它的更大军事侵略行动，是对察绥的进犯。1937年8月初，日军攻占平津后，准备对河北省中部举行大规模进攻，前此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日军进攻张家口以东地区，并于8月9日命令关东军从热河、内蒙地区西进。实际上，素怀占领察绥野心的关东军，早在7月27日即请命对西蒙“行使兵力”。7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也很快批准其以部分兵力入侵多伦。此部分兵力即前面提及的堤支队，该支队开往多伦途中，奉令改进天津，但于8月2日又由天津出发，5日侵入多伦。8月6日，关东军又从第二师团抽调1个大队，编成大泉支队，派往沽源。1937年8月9日，参谋本部向察绥进攻的正式命令下达后，关

东军更是兴师动众，大干特干起来。8月中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编成，后改称蒙疆兵团。为此，首先混成第二旅团归还关东军，并编入蒙疆兵团，8月2日到达张北，8日侵入多伦的堤支队和侵入沽源的大泉支队也被编入混成第二旅团。其次，关东军命第二师团临时编成的混成第十五旅团，即筱原兵团，经承德侵入张北。事变后第一批侵入华北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即酒井兵团归还关东军建制。此外，拥有4个侦察中队、两个战斗中队、6个轰炸中队、两个轻轰炸中队的第二飞行集团，也奉命参加察绥的侵略作战。关东军的察哈尔—蒙疆兵团司令官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他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指挥兵团，故亦称东条兵团。奉令与关东军东条兵团一同西犯的还有伪满军的热河支队，该支队由伪满靖安军和第五教导队于承德编成，共7000人，支队长为伪军热河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前面已经提及，8月5日该支队主力到达黑达营子后，遭中国军第八十四师大刀队急袭，支队两个营反正，朱家训成为刀下鬼。8月21日继任之支队长藤井重郎视察阵地时，又被伪靖安军班长李玉峰当场击毙。伪军热河支队于8月30日经赤城向宣化进犯，同中国军高桂滋部作战，并与关东军共同西犯。华北日军进攻张家口以东地区的部队，是关东军首批入关的混成第十一旅团，第二批从日本国内动员的部队到达华北后，又增加第五师团，其新任师团长又恰系关东军出身的名噪一时的板垣征四郎。这一路侵略军同来自伪满洲国的东条兵团，8月下旬对张家口形成分进合围的态势。伪蒙军司令李守信也带领主力积极参与这一侵略行动。1937年8月27日张家口沦陷。之后，板垣第五师团经察东向保定右侧迂回，目的是参加对河北中部的进攻。9月11日，南下攻占蔚县，继续进犯涞源。关东军东条兵团在侵占察哈尔后，又增加

原驻公主岭的机械化兵团和骑兵集团。此外，临时编成的混成第十五旅团也进入序列。与此同时，由德永恭助实际指挥的以兴安骑兵第五团为主编成的伪军，也随之沿平绥线继续西进。

东条兵团的下一目标山西大同，于9月11日侵占。前此，在侵入邻近大同的阳高县时，日伪军匪徒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9月初关东军侵入阳高县城，百姓惊恐不安，纷纷逃难，无人挂太阳旗。于是，关东军便以居民“通抗日军”之罪，进行“清乡”。9月7日，关东军抓捕群众700余名，关在县城南门魔圈、西门魔圈、关帝庙和眼光寺内。然后，对于凡是扎红腰带的、红布腰子的和手上肩上有老茧的，都说成是“抗日军”或“通抗日军”者，结果600余人死于非命，此为第一次惨案。3天后，9月12日，又进行第二次大屠杀，抓捕1200余人，屠杀130余人。两次共700余人遇难，三四十户遭灭门之灾。暴行的直接制造者，是东条兵团大泉部、长谷川部、辻村部和伪军。

东条兵团从大同向南继续进犯，直到晋北埽县。10月5日，混成第十一旅团被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后宫淳也是关东军参谋出身。关东军命其带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自大同西进，结果于10月中旬侵占内蒙包头。其他部队转归板垣第五师团指挥，进攻太原。11月上旬太原及其附近地区沦陷后，关东军大部分撤回东北。察绥地区则由第二十六师团继续占领，关东军骑兵集团留驻包头。日本中央军部之所以命令关东军西犯，侵占察绥，是因为那里早已为关东军所渗透。所以，即使关东军大部分撤离，察绥的占领与统治，实际上也掌握在关东军势力之下。

综观当时华北战场，日军继河北中部、察哈尔和太原进攻之

后，又开始对东线的山东和济南的进攻。华北方面军^①命令第二军于10月下旬进攻韩复榘的山东军，并准备进犯济南。至11月中旬为止，日军一直在山东“扫荡”，但未渡过黄河。不久，华东战场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遭中国军顽强抵抗后，兵分两路夹攻沪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急于控制胶济铁路沿线，和从济南到黄河上流左岸地区，故而要求急占济南。1937年12月开始的进攻济南的战役，关东军虽未参与，但由杀人魔王伊达顺之助操纵的伪满军两个旅，却被派往山东。伊达原系张宗昌部下，因与张结盟而以张宗援自称。“九一八”事变时，他与张宗昌的另一部下李寿山合谋拼凑伪军，后驻安东。“七七”事变爆发时，该部正于东边道“讨伐”。1937年末被调入关，沿津浦铁路南下。惟恐暴露马脚，入关前脱离伪满军，打着“山东独立军”的旗号侵入山东。这帮伪军纯属匪军，在东北即无恶不作，踏入山东更令人发指。伪“山东独立军”系多方啸聚的匪帮，屡有哗变，数次遭抗日军和八路军的致命惩击，但始终在齐鲁大地为患。山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以钳形扼制中国北部，且山东与东北隔海相望，交通捷便，往来甚密。因此，关东军不仅将伊达顺之助的匪军作为楔入山东的谋略匪帮，还先后引其他匪军入鲁，如王铁相部和刘桂堂部等。

日军占领南京、攻取济南之后，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以夹攻之势，同中国第五战区的兵力，举行徐州会战。在此次会战中，实际起日本陆军总预备队作用的关东军，又应急参加了对中国内陆的军事侵略。1938年5月10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关东军

^① 1937年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正式改编为华北方面军，辖第一、第二军和直属部队。

由其所辖之第二师团和第七师团，编成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田村原一少将）和混成第十三旅团（旅团长森田正范少将），共10000余人，配属于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参加对徐州的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急欲慑服国民政府，使之屈膝，故在徐州会战之后，准备于1938年秋，提前进犯武汉。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早在1937年9月即渡过黄河、北上抗日。八路军的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在华北大摆开战场，千方百计反击日本的疯狂进攻。同年9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重创骄横的板垣第五师团，并将部分部队开进冀西。时至1938年6月，邓华、宋时轮所率领的邓宋支队，竟挺进到冀东，建立了冀察热游击区，直接威胁着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和伪满热辽地区。而日军华北方面军，为徐州会战和准备进犯武汉，大批南调。在此种形势下，伪满军再次被利用，侵入华北侵略战场。1938年6月3日，伪满治安部秉承关东军意旨，命令伪兴安军管区编成甘珠尔扎布支队，由热河进入冀东，“讨伐”八路军邓宋部队。该支队由伪兴安骑兵第二、第五团及呢玛部队所编成，共1000余人，实际指挥者是日本人参谋长和顾问。6月10日，甘支队在热河集中，被列入关东军西南防卫区司令官滨本中将指挥之下。6月12日从承德出发，21日在五指山与邓宋部队交战。^①6月30日经迁安、马兰峪进入马伸桥。7月2日，进攻蓟县，使守城之数百名八路军遭受很大伤亡。烧杀抢淫，无恶不为，还迫使蓟县周围二里内的庄稼，全部割倒。7月中旬，他们又受西南防卫司令官之命攻打平谷，和在蓟县一样，残酷糟踏人民。到1938年底，甘支队“讨伐”作战40余次，使八

^① 当时邓宋部队称第四纵队，约6000人，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

路军和当地人民遭受很大损害。^①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未逞。武汉会战之后，国民政府虽西迁四川，但未屈服，战争长期化了，速战速决征服中国的梦想破灭。在战争的相持阶段，关东军和伪满军应关内日本侵略军的要求，仍多次进关参加“讨伐”“扫荡”，直至最后。

满铁随军夺取华北全部路矿

“七七”事变后，日本不断增加全面侵华战争的部队，虽然不都出自伪满洲国，但是日本国内动员的大批师团，大部分是由朝鲜进入我国东北，再从东北经海路（大连）或陆路（山海关）侵入华北的。初期的华北侵略战场尤其如此。例如，1937年7月26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65号命令，增派华北的部队，除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外，还有从各师团抽调的总数达86个番号的部队和军事单位^②，他们虽划归中国驻屯军指挥，但可将其一部分置于“满洲”。伪满洲国完全沦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基地。正因如此，随同日本侵略军侵入华北的后勤保障，也主要来自伪满洲国。在这方面，起无可替代的突出作用者仍系满铁。当年，如无满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不堪设想；同样，“七七”事变后，如无满铁的总动员，日军的侵略行动亦是寸步难行的。

“七七”事变后，满铁立即在山海关设立了输送班，组织增援部队和军火辎重的运输。随着战局的扩大，输送班前进到天

① 1938年6～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组建抗日武装达10万人。甘支队在蓟县、马伸桥时即镇压此次暴动。

②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みすず书房，第19～22页。

津，扩大为事务所。1937年8月23日开始，满铁在继续承担华北军事运输的同时，伙同日军铁道监部侵占和夺取中国铁路。相应地，自8月27日，满铁天津事务所扩大为满铁华北事务局，它是满铁在华北追随日军进行各种侵略活动的中枢，拥有10个部和1个运输委员会，是个庞大的机构。据统计，截至1939年8月，满铁派入华北的人员，光是铁路方面即达20610人，其中日本人为17162人，足足相当于两个师团的铁道兵。^①满铁人员在进行军运的同时，与日军铁道队一道，占领和经营华北铁路。华北路权关系极端复杂。如北宁铁路，满铁派遣团是采取“陆续打人”和“将实权收归我方掌握”的办法实际占领的。当然多数铁路是由日军占领，然后日军铁道队与满铁派遣团之间授受的。至1939年4月，京包、津浦、京汉、京哈、京吉、正太、胶济、同蒲、陇海、道清等线的干支线共5000余公里，全被满铁接管。在这些铁路上运行的满铁车辆，此时亦达5700余辆，为这些铁路原有车辆的1.5倍。^②满铁随军占领、经营华北铁路，首要的是为“确立、扶植我方（日方）势力的基础”服务，不能影响军事运输，一般交通运输“随时可改换为军用列车”。^③满铁对华北铁路是进行“军管”。这已为1938年4月27日日军司令官给华北伪政权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的备忘录所明确：“日本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对交通、通信及航空等军事上需要部分进行管理。”^④为此，满铁华北事务局正式被纳入日军序列，在日军的区处下对华

①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创立史》，第305页。

②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创立史》，第520～522，533～535页。满铁派往华北的货车占其货车拥有量的四分之一。

③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创立史》，第381～383页。

④ 日本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关于交通通信及航空的备忘录》，1938年4月27日。

北铁路进行运营。^①

铁路被日军视为“军事动脉”和“作战上的重要武器”。1938年全年日军都处于疯狂的进攻阶段。即使军事占领告一段落，对日军来说“华北仍是防共第一线而成为军事作战要地”。但是，随着战争的长期化，铁路不能只用于作战，铁路需要“发挥作战和经济双重作用”。赤裸裸的军管不是长久之计。因此，采取怎样的形式与办法维持华北铁路的占领与经营，就成为日本侵略者需要尽快解决的当务之急。最后的抉择是：将铁路名义上归还中国，采取“中日合办法人会社”的经营形式，这是“舍其名而得其实”的办法。^②1939年8月10日日本兴亚院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设立要纲》出台，它规定：交通会社经营铁路、汽车、国内水运和这些事业的附带事业；资本8亿元中，拥有所有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只出资3千万元；交通会社享有免税，征收使用土地、物品，设置专用电话，和发行相当于实缴股金三倍的社债等特权；临时政府虽有权监督会社规章重要事项的变更，会社的合并、解散的决议，和总裁、副总裁的选任与解职，但是会社总裁、副总裁的任免，章程变更，盈余处理，事业计划及其他事业上的重要事项等，最后均得由华北开发会社“批准”。^③凡此种种，既是日本统治集团各派势力角逐的产物^④，又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投降派激烈讨价还价的结果。只是1938年9月22日至10月30日，华北方面军的佐伯文郎少将即同临时政府

① 1938年7月28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向王克敏发出通牒称，“军组成直属机关华北事务局，并指挥该事务局长担任其运营。”

②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创立史》，第638页。

③ 华北交通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关系书类》，基本书类第8号，1939年4月17日。

④ 例如，日本海军和通信省就坚决反对华北交通会社经营港湾，故陆军方面不得不将此问题保留。

的头头王克敏进行了21次艰苦谈判。

满铁靠其对华北铁路交通在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曾公然企图摘取华北经济主宰者的“桂冠”。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经济政策的转换，满铁虽未遂所愿，但是日本政府却强调在华北的诸多方面，须充分运用满铁的技术与经验。^①所以，当日本各资本瓜分华北各经济部门时，铁路交通部门则非满铁莫属。1939年4月17日，正式成立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无非是满铁华北事务局的改头换面，满铁投入的不只是1.2亿元（现金2400万元）资金，还有1.5万名社员，会社5名日本人理事中，4名出自满铁，总裁宇佐美宽尔原即满铁华北事务局长。所以，实质上华北交通会社“是以满铁社员和满铁资本为中心而进行经营”的。^②华北交通会社既是华北开发会社的子会社，又是满铁的关系会社，而且不是一般的关系会社。华北交通会社设立伊始，便就“满华”铁路交通的“一贯经营”、业务联系、人事交流、重要规程以及重要资材的规格统一等，与满铁签定了备忘录，以期做到“一朝有事，必须和朝鲜铁道一道归并到满铁的下面，构成直属于大本营的大陆铁道总管理局。”^③满铁在坚持其“综合经营”的同时，始终以大陆铁路的“一贯经营”为目标。到头来，华北交通会社在组织形式上虽然并未归并于满铁，满铁也未蜕变为大陆铁道总管理局，但是，满铁与华北交通会社实质上所保持着的“一贯经营”“满华”铁路交通的格局，不仅对日本侵略者统一“满华”战时经济掠夺至关重要，而且在侵略作战上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①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事变处理要纲》的“谅解事项”即规定“充分运用”满铁技术与经验。

② 满铁：《满铁要览》，1942年12月，第331～332页。

③ 满铁：《部所长会议议事录，总裁训词》，1938年11月。

义。这些均为此后的历史推演所证实。

华北资源丰富。满铁一项秘密资料载称：“华北是中国少有的沃土，自古以来即称之为中原，称霸于此才能统治全中华。加以煤炭和其它矿区丰富，还包含着北平、天津等经济、金融、交通等中心地区，和黄河、白河水运，以及北宁、平汉、津浦等铁路的陆运……经济价值很大。”^①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我国东北之后，继而覬觎华北，并且终于从华北下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除了军事、政治目的外，首夺华北战争资源也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动因。“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和军部指示满铁尽速在华北设立兴中公司，其目的就是配合分割华北的军事谋略，在经济上推行华北“特殊化”政策，制造亲日的华北伪政权。这一政策不久虽然被公开的军事侵略所取代，但是，满铁在华北的身分依然是日本经济侵华别动队。除水陆交通设施外，华北的厂矿企业，几乎全由兴中公司所侵占。兴中公司的这种行动，完全是“配合作战，作为军事活动的一部分”而进行的^②。1937年11月23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正式通知兴中公司：“迅速恢复停业中的华北中国工厂企业，调查尚未开发的资源。”^③按军部命令所侵占和管理企业，称为“军管工厂”。至于“军管”的对象，“不管敌产或是民有财产，只要军部认为必要，就可以实行军管。在军管期间，军部对该管理财产享有绝对支配权，原权利人无任何发言权。”^④从1937年11月7日接收井陉煤矿作为第一个军管工厂起，到1939年4月，兴中公司直营、旁系、军管企业共达58家，涉及煤、铁、矾土、采金、铸造、窑业、盐、化

① 满铁经调会外事班：《最近的国际形势和对华北工作的意见》，1935年6月16日，特秘，打字件。

②③ 满铁档案：甲种，总体，监理，关系会社，兴中公司，67-5，第36号。

④ 兴中公司：《华北炭矿概要》，极秘，第23~26页。

工、棉花、运输等各个部门。其中多数是军管企业。

电气事业是进行战时经济掠夺和侵略作战，须臾不可离开经济命脉。“七七”事变后，由兴中公司“军管”的电灯工厂有：河北的保定、石家庄，河南的彰德、新乡，山西的太原城内、太原城外、兰村、古城村、榆次、太谷、祈县、平遥、临汾、新绛，江苏的徐州等15家。^①同时，兴中公司按军部要求，借用日本国内电力联盟和山西电力企业的技术力量，占领了京绥、京汉、津浦和山西地区的电力设施。此外，兴中公司按日本外务省指示，作为“紧急措施”还控制了上海和南京的电力设施。^②天津电业、北京华商电灯公司、冀东电业公司、齐鲁电业公司等，也在兴中公司的强制下，实行所谓“中日合办”。

事变前，兴中公司已着手掠夺开采之察南龙烟铁矿，事变后被关东军所占领。1937年11月，兴中公司奉军部命令，修筑运矿铁路，用以经由塘沽向日本八幡运输铁矿石。石景山炼铁厂也由兴中公司加快修建，1938年11月20日，日产生铁8吨的高炉投产。山西阳泉、太原两炼铁厂和太原铸造厂，亦于1938年初被兴中公司“军管”。

在华北的煤、铁、盐、棉四大资源中，煤炭居首。事变前，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测算，中国煤炭埋藏量为2436亿吨，占世界第五位，其中山西一省即占一半，华北5省占54.8%，加上陕西、河南占86.7%。煤质，炼焦用强粘结性煤、工业用半粘结性煤和用途广泛的优质无烟煤等，一应俱全。但是，华北矿权所属复杂。中英合办的有河北开滦，河南焦作，中德合办的有

① 日文档案抄件，108~279号。东亚研究所：《日本对华投资》，第359页。

② 满铁档案：总体，东亚，文书，关系会社，第5—1册，第2号。

河北井陘，中日合办的有山东淄博等矿。中国资本煤矿则有山东的中兴，河南的六河沟，山西的晋北、保晋，河北的门头沟、正丰等公司。华北近代化大煤矿共30余处。就产量而言，只开滦煤矿即占华北煤炭总产量的一半，600多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满铁即随同日军占领了山东半岛的路矿。1923年，淄博煤矿“中日合办”后，满铁是日方控股会社——山东矿业会社的最大股东。当时，满铁即垂涎于山西大煤田。1935年兴中公司出笼后，首先策划“把井陘、正丰的经营收归我手，以资炼铁”。^①因为该两矿均产强粘结性高沥青煤。事变后，日本借助于武力迅速将开滦煤矿以外的华北几乎所有煤矿一网打尽。兴中公司以“军管”之名占据的煤矿即达20个：河北的井陘、正丰、磁县、中和、永安；山西的阳泉、寿阳、白家庄、牛坨村、孝义、介休、灵石、轩岗镇；河南的六河沟、焦作、常口；山东的枣庄、中兴、华兴、宝兴；江苏的柳泉。随同兴中“军管”这众多煤矿的是日本各煤矿资本集团。当华北开发会社成立，兴中公司将盐、铁矿、矾土等企业相继交出之后，煤矿便成了主业。1939年兴中系统的煤产量为409万吨，1940年更制定了凌驾开滦的738万吨的生产计划。^②不过，华北煤矿后来被日本资本集团所瓜分了。

“七七”事变前，兴中公司即染指了冀东丰富的高矾土资源，它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最终兴中公司通过通州特务机关，侵占了冀东56处高矾土矿区。与此同时，冀东的金矿也成了兴中公司的掠夺对象。它为此而与住友会社相勾结。

事变后，兴中公司掠夺长芦盐的数量大增，1937至1939年，

① 1936年12月11日兴中公司社长十河信二致对满事务局总裁寺内寿一函。满铁档案，总体，东亚，文书，关系会社，5—8，第7号。

② 兴中公司：《华北煤矿概要》，第10～13页。

几乎翻一番，达40万吨。^①兴中公司在掠夺长芦盐的同时，还“军管”了在中国化学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久大制盐公司。这两家民族资本企业当时处于垄断地位。特别是永利化学公司拥有生产能力相当大的碱厂，受国家保护，却被日本侵略者所夺占。

由此可见，满铁及其华北别动队——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中，配合日军，起着日军难以起到的罪恶作用。但是，包括兴中公司的“军管”企业在内，都是过渡措施，权宜之计。华北方面军在指令兴中公司进行“军管”时即明确告知：“这只是适应当前的暂时变通办法，至于将来由谁正式开发和经营，正在研究之中。”^②满铁从来就极力图谋执华北经济掠夺之牛耳，犹如在我国东北那样，在经济上把华北也变成满铁的一统天下。因此，

“七七”事变后，满铁公然要求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铁”，并积极鼓吹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然而，“七七”事变后，竞相侵入中国的日本财阀们，既反对满铁大举入关，又厌恶在伪满洲国所实行的那种统制政策。侵略战争的发展与扩大，导致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无穷无尽的战时经济需要，要求日本垄断资本“出血”，拿出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决策者们，不能不一方面唯垄断资本家的意愿是从，另一方面防止民间资本自由地“无统制”的进入。最终确定的方针是：“一般产业”采取“自由投资”形式，“基础产业及国防产业有必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统制”。后者包括通信、交通、港湾、发电、配电、铁、煤

① 野田经济研究所，《战时下的国策会社》，第599页。除兴中公司外，日本在华北还有一个资本集团，掠夺山东盐。

② 1937年11月23日寺内部队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给兴中公司社长十河信二的通报。

炭、制盐等，对于这些部门，按所谓“冠军、内行”的原则，由日本各资本集团瓜分。为对这些事业进行投资、融资和所谓综合调整，1938年3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设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经济与资源的总枢纽。1939年1月31日，满铁将其对兴中公司持股转让给华北开发会社，兴中公司逐步解体。

满铁的勃勃野心虽然未逞，但是在华北仍保持着相当势力。除华北交通会社实质是满铁在华北的延长外，在煤炭工业领域占有重要阵地。这就是，华北煤矿被日本资本集团瓜分后，满铁不但是六大集团之一，即山东矿业会社，而且控制着六大集团之外的大同煤矿。该矿是西犯察绥的关东军东条兵团侵占后，交给满铁的，满铁以抚顺煤矿的人力与技术进行掠夺，它是日本侵略者重点掠夺目标。

伪满、伪蒙与汪伪

日军攻占平津后，积极拼凑伪政权，但方针未定。1937年7月30和8月1日，平津两市汉奸治安维持会出笼。8月20日，将国民政府冀察委员会封闭。此刻，关东军就华北伪政权问题，提出了所谓“强力建议”，主张“由大特务机关长通过顾问对当地政权进行幕后指导”。^①关东军并不承担华北军务，其设想与当时日本中央军部的策划不尽相同。然而，事实却证明，关东军设计的这一统治体制，一直为日军占领区所推行。华北的大特务机关，系指设在北平、天津和通州的日军特务机关。它们由驻屯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9页。

军参谋长管辖，是日军的政务执行机构，华北方面军成立后，它们受方面军特务部管辖。不过，因华北政情复杂，日军对若干军阀政客的策动尚需时日，正式伪政权的成立没有条件，只能作为伪政权的准备，暂先成立办事机构。1937年9月23日，在天津，

“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出笼，北平改称北京。日军占领太原和济南后，便赶忙拼凑伪政权，并试图使之成为中央政权，以取代南京国民政府。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意见一致，1937年11月，再次提出网罗一流汉奸建立华北伪政权的“强力建议”。于是，在南京陷落的翌日，1937年12月13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应运而生。政府主席空缺，汉奸汤尔和、王克敏、董康，分别担任议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七七”事变前设在通州的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属22县，于1938年2月并入河北省，汉奸殷汝耕事变后因保安队起义而畏罪潜逃。1937年11月、12月和1938年1月，河北、山西和山东的省级伪政权，相继出笼。

华北地方伪政权，省下分道，道以下设县。“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是通过拼凑伪自治指导部，由其派自治指导员或别动队，赴各地以“宣抚”之名，网罗汉奸，拉起汉奸武装，镇压人民反抗，而建立地方殖民统治的。在华北，基本上也是如法炮制：华北方面军命令满铁理事、华北事务局长宇佐美宽尔，将在进攻热河时从事“宣抚”活动而富有经验的八木沼大夫调来，在方面军特务部长根本博指挥下，以八木为头头，从满铁抽700人，从日本招募300人，编成10个“宣抚班”，受训1个月，然后分成随军活动和固定活动两种，在各地从事宣传、物资运输、修路、搜集情报、网罗汉奸和拼凑地方伪政权等活动。而各地伪县长等，多半由来自伪满洲国的随军翻译人员充当。

日本制造的华北伪政权，其性质被规定为：“反共亲日”。所谓“反共”，其意不言而喻；至于“亲日”，还包含“亲”伪满洲国的一层意思在内。华北伪政权的汉奸集团，融安福派、直隶派、国民党脱党者、华北封建商业资产阶级于一体^①，他们中间，包括省道县地方伪政权中的汉奸，不乏日本帝国主义豢养过的份子，但同伪满洲国的汉奸集团相比，不免略逊一筹。所以，应华北方面军之招，伪满一批汉奸和日本官吏，掺入华北各级伪政权。例如：原伪奉天省抚顺县副参事官园田庆幸和原伪安东省公署总务科长甲斐政治，后来分别成为伪山东省政府和伪山西省政府的最高顾问。华北的新民会和伪满协和会也一脉相承。后者的干将、石原莞尔的门徒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也是前者的创始人。

不过，对于华北伪政权，无论如何关东军只处于侧面协助的立场，伪满政权也只是派一部分官员参与其间。伪蒙政权不同，它是关东军一手制造，在人事上亦可视为伪满政权的延长，伪蒙与伪满关系也非同一般。

1937年8月，关东军东条兵团西犯察绥时，即武力进攻与政治谋略双管齐下，每占一地即拼凑一地伪政权。1937年8月27日占领张家口后，9月4日，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吉冈安直大佐操纵的，以杜运宇、于品卿为最高委员，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即挂牌开张，它管辖察南10县。继而9月13日攻占大同后，15日即宣布成立以夏恭为最高委员，前岛升为最高顾问的伪晋北自治政府，管辖晋北至长城北的13县。关东军带同李守信伪蒙军，于10月14日占领绥远、10月17日占领包头后，经10月27

^① 例如：赈灾部长王揖唐即为袁世凯制造共和党的份子；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北洋时期历任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等；治安部长齐燮元属安福派；司法部长朱深属直隶派。

至28日的第二次蒙古大会，撤销原伪蒙古军政府，重新成立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高场捐藏为最高军事顾问，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管辖察、锡、乌、巴、伊5盟的2市1县39旗和原和、包头2特别市。

察绥地区先后冒出来的伪政权，三足鼎立，互无隶属关系，但地域接壤，交通、经济关系密切。关东军急欲实行集中控制，故于1937年11月，由其指使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接管了8个伪政权相互关联和影响较大的产业、金融和交通等事项。金井章次任最高顾问，并代行总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总务委员会是联合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且于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日，8个伪政权代表还向关东军司令官提交了如下函件：

“一、鉴于此次事变贵国出师之根本义，为关于本委员会应处理一切命令，及执行应付随伴贵军占据之要请，贵军及日满国之充分协力，特关于贵军司令官之内面的指导，请向深甚之考虑。

二、本委员会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主要者，请由贵军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充当之。三政权内日满系顾问亦准右。

三、关于本委员会应管理或统制之重要交通及重要产业，应其必要委任贵军所指定之日满各机关经营，或为合办事业，如此情形时，请予方便。

四、关于本委员会管下之金融事项，以蒙疆银行为中央银行之根本方针，因关联此项将来所发生之事项，希望援助之。

五、本委员会暂时希望贵帝国军驻兵，故至管理或经营之事业生财政上之余力时，即应对于随伴帝国军驻兵之经费，

以现金或物纳之形式，尽力分担之。

六、将来缔结正式条约、协定等时，关于蒙疆地方之前记条项，限于本联合委员会构成之政权，实质上不加何等变更，实行调整。”^①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秘密换文上的签字代表是卓图巴扎布、于品卿和夏恭。1937年11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复函，表示同意，换文成立。由此，不禁使人油然想起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出笼前夕的情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方面看，伪蒙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都酷似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与再现。一目了然，关东军通过秘密换文所夺得的，是对察绥蒙古的控制权、人事权、经济权、金融权、占领权和收缴军费权。而这一系列大权的攫夺，却展演为伪蒙方面“主动”提供者。1938年初，“蒙疆”最高统治者关东军，由于直属于日本大本营的驻蒙兵团成立，交出了上述权力。然而驻蒙兵团继续贯彻关东军的路线，继承关东军的衣钵。更何况，关东军司令官还曾要求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重要事项须事先与关东军充分而密切地联系与协商。^②因此，关东军在“蒙疆”的势力与影响，始终远比华北为大。

1939年4月，日军突然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次让给了德王。这是因为，此时日军已在策划将联合委员会变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同年9月1日策划成为事

① 1937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与关东军司令官秘密换文。〔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书房，第167页。该件系按原文抄录，语言文字有些不通。

② 《关于蒙疆方面施政问题关东军司令官对驻蒙兵团司令官谈话要纲》。《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みすず书房，第176页。

实。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和夏恭任副主席，最高顾问仍为金井章次。

伪蒙疆政权，由日军部操纵，日本顾问和日本官员直接控制，此种体制与华北、华中伪政权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伪蒙政权与伪满政权的密切关系，甚而将前者说成是后者的延长或分身，也不算过分。前面的伪蒙与关东军司令官秘密换文规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充任顾问等职；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定“日满各机关”经营重要产业交通。关于前者，事实上伪蒙政权始终为清一色来自伪满的日本官员所控制。就最高顾问而言：首任金井章次原为伪滨江省次长；第二任大桥忠一原为伪满参议、伪外交部次长；第三任神吉正一原为伪满间岛省省长。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任总务部长也是同样：关口保原为伪满首都警察副总监；沼田不二男原为伪满交通部第一司长。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下属伪机构也无不如此。如：伪晋北政府最高顾问前岛升原为伪满参事官；伪察南政府最高顾问竹内元平原为伪满热河省专卖署副署长。后来，兴亚院蒙疆连络部长竹下义晴还同伪满政府——总务厅人事处签定了由伪满提供“蒙疆”所需人员的契约。不单是日本官员，伪蒙政权中的蒙族人，也多数来自伪满。伪满兴安局参与官曾称：“在蒙古自治邦之指导的蒙古人，出生于满洲国者实居多数，然非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移住于彼地者，而是满洲国成立之后，由康德四年十月（昭和十二年十月）由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诞生前后积极挺身前往者也。”^①关于后者，即所谓重要交通与产业方面：铁路由满铁关系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垄断经营；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分别归兴

^① 满洲产业调查会，《满洲国政治指导概览》，1944年，第129页。

中公司和满铁开采掠夺。

伪蒙疆政权和华北伪政权，最后终于在形式上都隶属于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而汪伪政权是1940年出笼的。在此之前，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时，日军沿袭其一贯作法，首先拼凑一个治安维持会，拉出北洋政府时期当过国务院参事的老牌汉奸梁鸿志，出面充当头头。1938年8月28日，以“切实灭绝共产主义，不使赤化危险波及东亚”^①为标榜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取代伪治安维持会。但它与华北伪政权、蒙疆伪政权一样，都只不过是各自分管一方的临时地方伪政权。在此之前，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即所谓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并公然表示“期待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发展。”^②当时，日军正在策划将华北临时伪政权改变为伪中央政府。然而，1938年形势剧变而多变，这不但是因为日军先后侵占了武汉和广州，而且从国民党营垒中突然分离出来以汪精卫为首的对日投降派。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接二连三发表宣言和声明，声言“调整日华新关系”，说到底就是要拼凑一个承认伪满洲国、亲日、反共的所谓“日满华提携”的新伪政权。汪精卫是经过日本特务影佐祯昭和金井武夫等人的谋略工作，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潜逃的，经昆明，19日到达河内，并于1939年2月29日，响应日本近卫第二次声明，发表了所谓艳电，该电内容在当时的各大报纸上广为宣传。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也像当年溥仪被偷运出天津时一样狼狈，在日本特工人员监护下，从河内偷偷潜入上海。继而他又于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维新政府浙江省地方行政组织关系法令集》，1940年5月，第9～10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86～387页。

5月31日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讨价还价。日本帝国主义本来期望占领南京后会出现重大转机，可是，不要说占领南京，就是经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乃至广州的进攻，都未出现预期的局面。正当日本军政当局派出土肥原这类老牌特务，卸掉其师团长职务，专事网罗中国一流汉奸，而却一筹莫展的时候，居然蹦出来个汪精卫，当然是如获至宝。而汪精卫自甘投降，形势自然急转直下。1940年8月30日，南京伪政权正式成立。为掩盖其傀儡性质，日本方面同意汪精卫的要求，伪政权的名称、组织、旗帜都沿用国民政府那一套，还演一场所谓“还都”的政治把戏。就这样，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标榜的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应运而生。

南京伪政权是作为伪中央政府而出笼的，它取代了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也随之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但它仍拥有很大独立性；至于对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南京伪政权的主权更徒具形式，那里始终为日军所直接操纵。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由伪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摇身一变而为伪政府主席，并公布了《日华基本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通过前者，汪精卫在“共同防共”的幌子下，拱手出让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允诺与日本“合作开发”“特定资源”，准许日军永久“驻扎”，满足日军在铁路、航运、通讯、港湾等方面的所谓“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①；根据后者，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汪伪对伪满洲国的所谓“承认”，和与伪满洲国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① 《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所附秘密协议和协定的译文，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13～326页。

早在伪维新政府时期，伪满政府便以“提携”之名，在上海设立伪满的通商代表部。^①汪精卫国民政府出笼并“承认”伪满洲国后，双方竟成为所谓“外交”关系。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两个汉奸集团打得火热，互派“大使”，互设外交机构，互相访问，等等。^②因为，日本操纵南京伪政权的办法，与其他伪政权不同，不是直接安插日本官员攫据要位，而是设立日军顾问部进行控制，对于汪伪内部和人事等，只能采取另外的办法予以左右。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极力以伪满洲国影响南京伪政权，在人事上大肆进行渗透。而且，有的打入汪伪政权的伪满军政人员，是带着日本方面所交给的监视汪伪集团和安插人员的任务的。所以，在汪伪政府中，特别是伪军中，伪满出身者比比皆是。例如：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令厅长高文卓、陆军部军械司长魏传镛、南京要塞司令官尹作乾等，均曾在伪满任要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利用伪满汉奸集团，强化对汪伪集团的控制，并把统治、掠夺伪满的那套办法，移花接木化为汪伪政权的施策。如曾任伪满宪兵司令官的王遇甲，就转而受任专门镇压人民的伪武汉行营的清乡总局长。

张 鼓 峰 事 件

日本帝国主义在接连大肆侵华的同时，对苏战争也始终是其军事计划与行动的基本部分之一。侵华与犯苏两者不能互相取

^① 伪满上海通商代表部于1941年11月改为伪满洲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通商代表王庆璋也变成了伪满的总领事。

^② 1942年5月8日，汉奸汪精卫曾到伪满洲国进行访问，同年6月，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等去南京回访。

代。苏联十月革命时，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和1919年关东军成立后，日军部历次的对苏战争设想，都是无法抹杀的铁的历史事实。至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它即是为扩大侵华和吞并全中国所做的准备，同时也是为对苏作战建立前进基地。诚然，在“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的进攻热河期间，关东军的对苏战略是防守，惟恐苏联出兵干涉，在军事侵略行动中，竭力避免刺激苏联和引起纠纷。但是，夺取位于北满的由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乃日本彻底占领和统治我国东北之所需，故而日苏紧张关系无法消除。当时，日本特务唆使白卫份子、胡匪、暴徒，破坏中东铁路，袭击车站，颠覆列车，日伪当局制造苏方“盗窃货车”事件，单方中止直通运输，强行切断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铁路的连结，逮捕中东铁路苏籍职工和苏联公民，等等^①，无所不用其极，致使中东铁路无法经营，北满大地又起乌云。经过日苏之间的漫长、艰难谈判，1935年8月23日，日苏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总算签字。但是日苏关系并未根本缓解。铁路纠纷转为边界问题，小规模军事冲突频发。

30年代的反共反苏带有国际性质。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10月29日，日本通知美国政府废除华盛顿海军军备条约。^②国际法西斯在重整军备之初，就把苏联视为称霸世界的首要障碍。1936年11月25日《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签定，此即一般所说的“防共协定”^③，从而更加导致了日苏紧张关系的加剧。然

① 参考《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第4分册，第1190~1218页。

② 经过1921年11月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2年2月6日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英、美、日海军主力舰吨位为5：5：3的比例，并于10年内停造主力舰。条约有效期到1936年末，终止条约需在2年前书面通知美国政府。

③ 该协定附有《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协定》。1年后，意大利法西斯也加入协定。

而中国这块肥肉更富有吸引力。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在对付苏联之前，先给中国一击，造成更加广阔的后方，再调头北进。因此，尽管1937年6月30日在黑龙江边境上发生了干岔子岛事件，却没有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于一周后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干岔子岛位于瑗珲东南，黑龙江上游，在其上面还有个金阿穆河岛，该二岛屿，日伪同苏联之间素有归属之争。1937年6月19日，有苏联警备队登上该二岛屿。日本参谋本部遂下令“采取适当措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亦于6月24日命令驻北满之第一师团进入战备状态。然而，6月29日参谋本部忽又取消动武方针。7月1日，冲突重趋激化，并互相进行了炮击，但未导致更大冲突。“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积极支持，贷款1亿元，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因而日苏关系，紧张加剧，纠纷日繁。日本参谋本部还判断：苏联为牵制日本侵华战争的兵力，很可能采取某种行动。^①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进其刚开始的对中国内陆的大规模入侵，加倍警戒苏联边境的动向，甚至不惜行使武力击溃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日本军部认为，干岔子岛冲突发生后，苏军的撤退，是日军击沉其1艘炮艇的结果。因而诉诸武力对待边界纠纷的叫嚣，甚为猖獗。

张鼓峰是座海拔149米的秃山，位于珲春县图们江上游20多公里的东岸，邻近还有座略低于张鼓峰的沙草峰。那里既同苏联接壤，又靠近朝鲜。当时，关于张鼓峰的归属，日伪同苏联之间存有争议。珲春虽地处伪满境内，但日本陆军当局却命驻守朝鲜的第十九师团担任警卫。可是，第十九师团并未在张鼓峰配置

^① 参考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71页。

哨位。1938年7月11日，日军声称，发现张鼓峰上有苏联士兵在构筑工事。7月15日，日本便通过外交途径，照会苏联要求其从张鼓峰撤军，但遭拒绝。关东军当即强硬地要求行使武力。日本大本营也认为，按张鼓峰的地形，很少可能酿成全面战争，故可借此地对苏军进行武力侦察。于是，拟定了不使用飞机和坦克的有限兵力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驻朝的第十九师团执行。但计划并未获最后批准。业已开始行动的第十九师团，接到的是撤回的命令。是时侵华战场上，日军正在积极准备寄以莫大希望的武汉侵略作战，日本大本营收回成命，停止犯苏，大约也是惟恐事态扩大，危及侵华战争全局。然而，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出身的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却以苏军士兵仍在沙草峰构筑工事为词，作为“独立判断”的行动，向其所统率的佐藤联队长下达了进攻命令。7月29日，日军两个大队分别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双方伤亡较大。日军以为胜券在握。不料苏军大举反攻。8月2日，大批苏军飞机轰炸日军阵地。此时，苏联远东军迅速编成了由3个步兵师、两个机械化旅和国境部队、航空队等构成的第三十九军，从8月6日起全线进攻日军阵地。日军宣称，他们实行的是“专守防卫”，采取固守阵地的战术，连续数日遭受苏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向苏军求和。苏方虽处于进兵状态，但同意议和。8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翌日停火。

关东军在诺门坎一败涂地

据统计，日军第十九师团各部队在张鼓峰战役中，死伤近

1500人，处于第一线的第七十五联队死伤过半。^①但是，黠武主义的日本军阀并未从张鼓峰事件中汲取教训。一年后，侵略成性的关东军又在伪满西部边境发动一场规模更大、失败更加惨重的侵略战争。

诺门坎地区位于海拉尔以南约200余公里，亦即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古朗一线至哈拉哈河地区。在那里，围绕以哈拉哈河为边境线的问题，日伪与外蒙之间素存有争议。并且，在包括诺门坎地区在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边境线上，局部性边境军事冲突，屡有发生，但都未演成大的战争。诺门坎战争的爆发，与张鼓峰事件后的关东军侵略政策直接相关。1939年4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向全军下达火药味极浓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其基调就是不惜以武力解决边境纠纷。稍加具体言之即：发生边境冲突时，须不失时机地“严惩”对方，可越境追击；边境不明地区，防卫司令官可“按自己的判断划定边境线”，并明确通知所辖部队；前线部队可以“果断的行动”。对待一旦发生的纠纷，不必顾虑事态发展和善后处理问题。^②这不啻于发动攻击时的动员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已陷入胶着状态；国际上，欧洲局势急剧恶化和《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势将废除，都预示了日本的暗淡前景。关东军气焰嚣张，恐怕也是反映了日本军阀不甘认输的气极败坏、不计后果的变态心理。加之，关东军一贯骄横，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比吃败仗的朝鲜军高出一筹，有恃无恐。

在这种氛围下，司令部设在海拉尔的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长

^① 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译本，第85～86页。

^② 榎本舍三：《全史·关东军》，第251页；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05页。

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一面传达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定，一面根据所谓外蒙军数百人越过哈拉哈河的情报，命令东八百藏中佐率骑兵联队出击了。此为发生在1939年5月13日之事。5月17日，该部队主力撤回后，又说有外蒙军进入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师团长便又命令增派由步、炮兵1000人组成的支队，会同原先派出的东支队，进击外蒙军。不料，就在渡江点的战斗中，东支队骑兵几乎全军覆灭。此即所谓的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日军本来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小松原师团长却向关东军谎报军情称，空战绝对有利，在日军无损失的情况下，击落苏军飞机59架。

关东军自然不会罢休。根据小松原师团长的申请，关东军幕僚会议决定，除投入第二十三师团的主力外，还增派特新组成的安冈正臣中将指挥的支队。该支队拥有轻型坦克两个联队、机动炮1个联队，和第七师团的1个步兵联队，以及仪峨彻二指挥的第二飞行集团。即总计以步兵13个大队、反坦克炮12门、坦克70辆，汽车400台、飞机180架，共15000人的兵力，投入反攻。1939年7月1日进攻开始。行动前，关东军用130多架飞机轰炸了苏军塔木斯克空军基地，数以百计的苏军飞机被毁。关东军妄图发起进攻时掌握制空权。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首先在哈拉哈河架桥，以期深入左岸苏军阵地后方。7月2日，确已渡及左岸并沿河南下，但是主力部队遭受苏军数百辆坦克的强大攻击。面对排山倒海般的坦克阵，关东军反坦克炮拼命射击，单兵冒死投掷汽油瓶，均无济于事。7月3日午后更加不利，傍晚不得不退回右岸。在哈拉哈河与另一河流会合处进击苏军的安冈支队，亦因40辆坦克被击毁而撤退。7月5日，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妄图再逞，结果在苏军强大炮火反击下，裹足不前。于是战线呈胶着状态。此时关东军深感炮火不足，自7月23日起，增加重炮部

队，用86门重炮，每天以15000发的密度攻击苏方。但因苏军拥有更多更强大的炮火威力，关东军无法扭转劣势的不利地位。前此，7月16日富拉尔基江桥还被轰炸，关东军深感震撼。

但是，关东军并未增派部队，只将前线部队编为第六军，由获洲立兵中将任司令官，拟与苏军进行持久战。但苏军方面却对第一、二线全都增加了兵力，准备尽快决战。同时，由于天气原因，关东军没有侦察清楚苏蒙军增援情况，继续犯了低估对方的错误。8月20日，苏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展开猛攻。23日，苏军数不尽的坦克群阵和大量兵团，包围了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和第七师团的森田旅团虽曾还击，但在苏军强烈轰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关东军黔驴技穷，孤注一掷了，它把所辖的第七、第二、第四、第八师团，全部编入第六军，与苏军决战。然而，在诺门坎的战场上，双方对抗的，不只是精神和“武士道”，还有装备和技术。由于苏军把大批新式坦克和飞机投入战场，始终掌握地面优势和天上的制空权。面对注定的惨败，日本大本营不得不于8月末悻然下令停战谋和。

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们都受一种规律支配：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不计后果发动进攻，而结果却以惨败而告终。关东军给日本陆军造成创伤，诺门坎战争是日本军事史上可耻的一页。投入兵力56000余人，而死伤高达17000余人（战死8440人，负伤8766人）。尤其第二十三师团，伤亡率竟达73%。^①为此，战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等均被撤职并打入预备役，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人事调整，以安军心。

在诺门坎战场上，一败涂地的还有伪军。此次是伪军空前大规模被用于外侵。前后两个阶段的诺门坎战争，伪军都是参与者。

^① 数字与史实均参照样本合三：《金史·关东军》一书。

第一阶段被调参加的部队，是1937年春被编为“国防军”的兴安师，先是兴安骑兵第八团，后又增派第一团。他们主要充当关东军耳目，侦察、带路和收容残兵败将。在关键的第二阶段，伪军被总动员，伪治安部还应急设立了以朱榕为司令官的前敌司令部。参加的部队有：野村登龟的兴安第二师，即以兴安骑兵第四、五、六、十二团为中心编成的兴安支队；还有以第三教导队为主力的石兰支队；以及铃木支队、汽车队、高炮队、兵站部等。伪军原来被当成日军的后援部队，后来也担任一翼的独立作战。问题在于，号称“精锐”的关东军都丢盔卸甲，一败涂地，伪军更不堪一击了。只伪兴安师即死伤2800余人。^①伪军实际是临阵溃散，还有数百人起义，进入苏蒙。关东军为发泄其恼恨，集体屠杀了伪兴安师的逃兵。

“关特演”及其前后

日本在诺门坎战争中紧急煞车，停战求和，固因战局极端不利，同时也与世界形势骤变有关。正当关东军决定举全力与苏军决以雌雄，而日本参谋本部大伤其脑筋的时刻，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开始进军波兰。前此1周，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3天，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远东的中国战场，以武汉会战为契机，转入长期化，对汪精卫的谋略工作也处于微妙阶段。形势剧变，变幻莫测。正是此种形势，促使日方立即停止日苏冲突。苏联也有两面作战问题，故在打击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上，始终保持一定

^① 小泽荣光：《满洲国军》，第152页。

的节制，未因追击而更多地突破边境。苏联之所以痛快地响应日方的停战要求，也是为了便于集中力量应付瞬息万变的西欧复杂局势。由于世界大战业已爆发，尽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在，也不能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进行防御，只因有条约的束缚，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但对极端颠狂、妄想以闪电战术迅速侵吞全欧的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苏联是片刻难安的。就在此种形势下，1940年7月18日，日苏就诺门坎战争而激化的边境纠纷达成协议。那段边界基本上是按苏方主张划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因为日益侵害了美英在华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美英方面不能不从对日的两面政策，转向抵制、封锁，以至最后全力支持中国。而德国在西欧，正肆无忌惮地进行横扫，到1940年6月，不但占领了挪威、丹麦，侵入比利时、荷兰，而且夺得了法国巴黎。对此，4年前已与希特勒德国签定“防共协定”的日本，不能不着急眼红，而加快“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步伐。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同盟条约”签定，从而正式建立了国际法西斯军事集团。不过，欲从亚洲排除美英势力，至少还必须继续调整同苏联的关系，暂解后顾之忧。苏联为因应西欧局势，警惕德国进犯，自然也愿意响应日本之要求。于是，在1941年4月13日，日苏签订了“中立条约”。

然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同苏联签约，都不过是暂时的缓兵之计，一旦时机到来，必定背信弃义。果然，日苏签约两个月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倾巢出动，倾注全部主力，妄图以闪电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苏联，打下莫斯科。苏军暂时节节败退。就在此时，日本法西斯野心发作，妄图趁火打劫，撕毁条约，呼应德军，

夹攻苏联，置苏联于死地。1941年7月2日，苏德战争爆发仅仅10天，日本政府就赶忙炮制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对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在德苏交战的进程对帝国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①

上述国策是根据御前会议精神做出的。日本陆军立即于7月7日和7月16日，分两次下达了动员令，积极进行对苏战争准备，即以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为名的军事侵略行动。而伪满洲国也就随之沦为这种侵略行动的直接军事基地了。“七七”事变前，关东军保持在拥有三四个师团和若干独立守备队与独立混成旅团的水平。例如，1936年末，关东军序列包括：第一、第九、第十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1937年5月则为：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第一至第五独立守备队。“七七”事变后，日本大本营两次强化关东军。一次是准备进攻武汉期间，因日军兵力进行大调整，为加强对苏戒备，关东军大幅度增加了兵力。1938年6、7月间，除新编的第二十三师团和第一〇四师团编入关东军外，新编以第一师团为基干的第四军，第二师团则编入“七七”事变后不久新编的第三军。到1938年7月，关东军已拥有：两个军（第三、第四）、8个师团（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十二、第二十三、第一〇四）、第一独立混成旅团，以及独立守备队。第二次加强关东军是在诺门坎战争期间。战争爆发前夕，1939年5月19日，编成以土肥原贤二为司令官的第五军；战争爆发后，1939年8月4日，成立第六军。同时还从华北、华中调入9个独立高炮中队，并将新编的第二十四师团编入关东军。以“关特演”为名

^① 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42页。

的关东军兵力扩大，是第三次大膨胀，也是日本“陆军创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兵力动员与集中”。实际上，日本陆军的这场大调动，早在1941年6月26日参谋本部即开始策划。他们估计，到8月上、中旬，由于德苏战争，苏军西调，远东苏军地面部队可望减少一半，空军和其他军直部队亦可能削减三分之一。这样，苏德战争前所估计的远东苏联兵力，其30个狙击师将减至15个，数以千计的坦克与飞机也将锐减。这是开始进攻的最好时机。日本军部还认为，远东苏军战斗力水平只相当于日军的75%，因而动员20个师团，即可保持对苏军的两倍优势。可是，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将给军运和后勤带来不堪设想的压力。而军部的如意算盘是：8月末打响，10月中旬结束战争。当时，关东军计划以其拥有的12个师团和两个飞行集团为骨干，编成4个军和1个航空兵团，并把师团编制扩大到战时最大限度。此外，驻朝的两个师团，日本国内的第五十一、第五十七师和多达200个直属部队，都编入关东军。还计议从华北、华中调入若干师团。于是，关东军顿时膨胀到70万人，军马14万匹。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特命令伪满洲国政府全力介入战备。结果，为关东军搜刮的各种战争所需物资，总值达5亿元，同时强征千千万万劳工，在艰苦条件下，紧急赶修铁路、公路和各种军事设施。与此同时，战时统治也骤然加剧。就在“关特演”期间，关东军以其5个独立守备队，设立了关东防卫军，它是专门“讨伐”抗日军和镇压战时人民起义的武装集团。

正当“关特演”紧锣密鼓大规模进行之际，日军发现，苏军西调情况，非如预计，为数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关东军一味增兵备战，恐将引火烧身。于是，日本军部决策者间，对“关特演”产生分歧；陆军与海军之间固有的北进、南进之争，也重趋

激化。最终陆军方面妥协，它放弃了对苏莽撞挑战的主张。1941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通过的《帝国陆军作战要纲》内载：

“一、在满洲和朝鲜以十六个师团，对苏联实行严重警戒。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三、对南方以十一月末为目标，完成对英美的战备。”^①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主攻目标，如此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也并非“关特演”期间形势转化之所致，如下的时间表表明，它也是日本与美英矛盾积累与加剧的必然结果：1940年1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因美国不同意而失效；1940年9月23日，日军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美国随即对日本实行废铁禁运；1941年3月，日美谈判破裂；同年7月又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英荷等国立即冻结日本财产，停止供应石油等战略物资。这一切不仅导致上述参谋本部8月9日“陆军作战要纲”的出台，也决定了9月6日的御前会议势将通过准备与美英开战的《帝国国策遂行要纲》。

① 岛田俊彦著、李汝松译：《日本关东军覆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